

孙隆基 著

历史学家的 经线

〔更新版〕

// 本书文章将从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思想史整个地翻转了。对不知“世纪末思潮”为何物的治史者来说，这个历史意义的岩层是不存在的，而我在教授史学知识论的课程里，也常用这个例子来论证：史学知识的基础乃治史者是否知道有这回事，如果他不知道，就等于不曾发生。

// 笔者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本文集中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独具一格，都是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少见的。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历史学家的经线

孙隆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学家的经线 / (美) 孙隆基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86-5313-6

I. ①历… II. ①孙… III. ①史评—世界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0074 号

历史学家的经线

著 者: [美] 孙隆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313-6/K·47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更新版序

《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于 2004 年出版后，岁月匆匆，已历十载。今乘三辉图书约请再版之机，做与时俱进的更动，把原版的第八篇《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第九篇《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抽掉，另补上《公元 1919 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以及首次发表的《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两篇。在篇次上亦有所更动。

抽掉的两篇，是鉴于其内容已在 2010 年出版的《弑母的文化：二十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获更完整的发挥，然该书卷秩繁浩，如有读者视从新版中删除掉的两篇论文为该书之简易版，仍可参考 2004 版，在此意义上，2004 版变成了“古典版”。至于新版，因更动的幅度颇大，故称作“更新版”，比“修订版”来得贴切。

抽掉了上述两篇后，有关“心理”的部分似乎只由《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一文承担，故书名虽照旧，却移除了副标题。其实，新添的两篇史学论文是有关“世纪末思潮”的，而该时代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期，现代文化里弥漫的心理话语化亦肇于斯。《公元 1919 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中提出的第四种故事就是从“世纪末”的角度诠释五四时代。它与第一、二两篇中论及的国民心理学、群众心理学和第四篇中的文明没落论、人种退化说为同一个时代氛围的产品。因此，该论文被编排在更新版中的第三篇。按此理，《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该紧接着才对，然该文与鲁迅研究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将它排在原版的两篇鲁迅论文之间。

其实，这些文章加起来，是将从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思想史整个地翻转了。对

不知“世纪末思潮”为何物的治史者来说,这个历史意义的岩层是不存在的,而我在教授史学知识论的课程里,也常用这个例子来论证:史学知识的基础乃治史者是否知道有这回事,如果他不知道,就等于不曾发生。我在 2002 年的英文著作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中已专门从“世纪末”角度诠释五四,一份澳大利亚学报将它给了一位在美任教的港人写书评,她显然一生未听闻 *fin de siècle* 一词,遂说这本书的缺点是谈“五四”而居然不提“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这类茫无头绪固不限于虾米小学者,一位“中研院”所长级的同侪在久别重逢时问起:“很久不见,你的‘末世纪’研究得怎样了?”

中国现代思想史鸟瞰和鲁迅研究这两组文章的中分线是《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一文,也正是赋予全书之名的论文,但在书中却很难归类,其功能遂成为分界线。除了这些更动外,我在新版第一、二、三、五篇后面都加了附录,乃因为用了该四篇作为历史知识论课程的教材,遂将讨论题与老师的评语附在后面,望有助于对该四篇论文的读解。

孙隆基

2014 年 6 月 13 日

序 言

这本集子是作者近十年心血之凝聚。原本打算收入十篇曾在学报和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在成书前予以增订改写。其中五篇改写的幅度很大,待到了交稿期限时,长度已经接近原来预计的十篇文章的篇幅,遂抽掉《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范围的考察》。它是宏观历史思考,是笔者纪念千禧年的研究计划,已在发展成书,因此没有再把文章改写的必要。

收入集子的《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南与北》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第一篇曾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没有再做修订。第二篇的原型是1991年的一篇英文论文和1994年的一篇中文论文,目前则加以大规模的改写,并期待将来发展成英文书。第三篇则由1992年的一篇中文论文《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南与北》发展而成,但现今的内容大致上采自200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国民性:从国家格局到个体性》(*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的第五章。

本文集中分量较重的是两篇鲁迅研究:《“世纪末”的鲁迅》和《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后者的前身是1985年在美国发表的一篇中文文章,副标题是“鲁迅参与政治的难局”。前者则以中英文出现多次——1992、1994、1995、1996、1997年,最近一次则是2002年那部著作中的第四章——每次都有不同,反映出笔者对“世纪末”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至今亦不得谓完成,说得上是路途坎坷。难怪从无人从这个角度研究鲁迅。

《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是199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是我的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续篇,保持了后者的理论框架,并加入了大量心理测验的材料。它由我翻译成中文,亦是第一次以中文的方式和读者见面。在写这篇文章时,笔者的思路仍停留在结构主义阶段。

《历史学家的经线: 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的原文也是英文: “Historians’-Warp: Problems in Textu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但英文版至1994年才面世,内容稍为不同的中文版则已于1990年发表了。目前收入的是后者,除了原文中的“马来亚”被编辑误改为“马来西亚”如今把它改正之外,未再做其他修改。这篇主要是介绍后结构主义的史学方法,题目中“warp”这个英文字语带双关,既具织布机上的经线之意义,也具扭曲的意思。这个题目很别致,因此把它当作整本文集的正标题。

至于副标题,考虑的是我历来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并重。本文集除了《当代中国文化: 结构与情感构造》一文外,心理学色彩比较浓厚的是《飞蛾的沉默: 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和《缺乏“性”与“暴力”: 非美国式人格》。它们研究的内容是美国史,同时可归入心理学史范围。其实,有关鲁迅的那两篇都涉及心理学和心理学史;谈法国大革命的《两个革命的对话: 1789 & 1911》则介绍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流传。

笔者可以保证的一点是: 这本文集中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独具一格,都是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少见的。

2003年11月13日
序于美国孟菲斯市

目 录

更新版序	I
序言	III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孔教天下主义的终场曲	5
戊戌年代的种族思想	8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11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15
民族始祖的发明：黄帝	19
结语	22

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

前言	27
“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	29
维新派与革命派争夺的“法国大革命”	32
法国大革命与国民性	35
中华民国与法兰西共和国	41
法国剧本，中国演员	45
以法为师的中国启蒙运动	50
“群众心理”与“暴民政治”	56
法国革命史成为中国“反革命”的灵感	62
尾声	64

公元 1919 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

导论	71
三种现成的、为人熟知的借喻	72
“五四乃文化革命”命题的意义岩层之考古挖掘	73
在比较历史学里“五四乃文化革命”故事布局所能运用的桥段	77
“文艺复兴”与历史上“民族复兴”的关系	78
比较历史学能为“五四乃民族复兴的一环”提供的戏码	83
“五四乃启蒙运动”的问题	84
有待建构的第四种故事：从“世纪末”到现代主义	86
结束语	90

南与北

汉满矛盾变成南北对立	98
民国时代的南北战争	100
“南北论”学术传统的形成	103
外国人的“南北中国”说	107
南北地形与人种的关系	109
优生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结合	111
北温带说	114
亨廷顿与潘光旦	117
逆境、人种退化与“选民”	120
人地学史观的流行	124
张君俊之人族改良纲领	126
林语堂似是而非的南北对立论	133
区域类型学的风行一时	138
黄与蓝：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142

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

文化解体与意识危机	150
启蒙与革命	155
启蒙与民粹主义	164
结论	169

“世纪末”的鲁迅

何谓“世纪末”？	178
更广义的“世纪末”	184
鲁迅创作生涯之始开宗明义的宣言	190
鲁迅的“无政府个人主义”问题	194
把“民族偶像”与“异乡人”混为一谈	202
过于早熟的“大众人”批判	209
天才、疯子、庸众	213
世纪末病：梅毒	216
文明没落论	221
人种退化的梦魇	224
本能衰退说	228
家族败亡史	233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鼎盛期	234

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

前言	245
“世纪末”作为一股文风	245
“世纪末”作为一个时代	247
“世纪末”乃非理性主义的全盛期	249
王国维与叔本华	250

王国维学术生涯的断层问题	256
章太炎与哈特曼	262
鲁迅与尼采	268
“世纪末”在民初的震波	275

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

“吃人”意象的阶级性问题	281
鲁迅的“群众”观	283
皮肤敏感症和幽闭恐惧症	290
力拒庸愚的“复仇”母题	294
鲁迅与卡夫卡	298
无边的黑暗和思想的绝路	302
鲁迅加入左翼文艺运动前后	307
在左翼阵营里	310
结束语	314

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

“一人”与“二人”的文法	319
在符号学层次上社会对个人的极权	323
中国人情感构造的形态学	325
号称高情感环境里的收敛型情感构造	329
中国人情感构造的失控和“躁狂”成分	337
从牺牲学(victimology)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	344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孔教天下主义的终场曲

戊戌年代的种族思想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民族始祖的发明：黄帝

结语

现代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四十年间,欧美各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活动频密,为国民共同礼拜的对象之诞生亦多半集中于此时期。法国的巴士底日并非大革命元年(1789)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后自然而然成为周年节庆,而是第三共和国于1880年设立的官方节日,即今天的法国国庆日。大革命到了第三共和国才获全面肯定,但它一直是一个造成社会分裂的记忆,把其中任何阶段的领袖挑选出来当“开国元勋”都不妥当,只能尊崇一些泛泛之符号,例如三色旗与巴士底日之类。美国的花旗虽然设计于独立战争,但学校里对国旗的周日敬礼仪式是在19世纪80年代始普遍流行,目的是把新移民塑造成“美国人”。^①但这类后起的“发明”之效果,却具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之印象,此印象并谱成天衣无缝的国史话语。

霍布斯鲍姆所谓“传统之被发明”,并无凭空捏造之意,乃指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而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会有,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塑造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这个塑造并非一劳永逸。19世纪下半叶,西方民族国家多不将犹太人包括在内,他们对共同过去的贡献反被设想成是祸害;至于占人

^① 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71—273, 280.

口一半的妇女,在共同回忆里也不会有份。但今日撰写的“国史”里已不能把这些成员剔除。

这里顺带解释:欧洲许多国家虽有悠久之“国史”,但其“建国”则在19世纪下半叶。它指的是由国民共同参与的民族国家,而非原先的王朝邦国,因此,最邃古的“民族起源”反而是国民生活最晚近发展之产品。欧美诸国在19世纪70年代始陆续进入男子全民普选的“现代”。德国和意大利连国家统一都至1871年才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清代中国的现代化,即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起步并不算晚,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了几年,而当时的俄国才开始取消农奴制,美国正在进行废除黑奴制的南北统一战争。

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也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发明。在幕府时代,天皇并非封建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一般老百姓对他也很隔膜。1868年倒幕后,明治天皇第一次东巡江户(东京),江户一带的民众误把他当成民间传说的神明圣德太子。新政府派往民间宣扬爱国与崇敬天皇的宣传队,在三河地区被误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导致暴动。这类宣传已具现代政权动员民众的特色。明治政府的其他新生事物计有:在1873年开始设立公众假期,首批假日包括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之登基日,以及明治天皇的生日。^①前者是神话故事,后者日期确切,但两者都成为官定的全国假期则是一个新发明。

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则是20世纪的产品,至战后的台湾与香港仍载于中小学教科书中,至今仍有中年以上的人奉为事实。从时间上说,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②黄帝后来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把它和西汉流行的五行学说联系起来: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正朔,定服色为

① Takashi Fujitani, “Inventing, Forgetting, Remembering: Toward 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tion-State”, in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85—86, 88, 91.

②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顾颉刚等编:《古史辨》7册上编,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第189—209页。

黄,史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史记》遂置黄帝于帝系之首,按五德终始论推断历史,至汉而完成一循环。^①在信仰系统方面,中华自汉武帝以后崇儒,而儒家祖述尧舜。汉初之道家曾黄老并称,黄帝至后来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和世上人口最众的民族之始祖身份大相悬殊。

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邦国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甚至有人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屈居一个“国家”之下。作为孔教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只可能是孔子,而不可能是什么黄帝,乃毋庸争辩之事实。中华这个“天下”演变成西方式“国家”,在符号学层次上由19世纪90年代“戊戌维新”开其端。

孔教天下主义的终场曲

1894年,郑观应发表《盛世危言》,在首篇《道器》中写道:“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郑庆贺光绪帝身逢其会:“恭维我皇上天秉聪明,宅中驭外……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自强的目的并不是建国,而是为了一统天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②这类天下主义修辞实在令人感到惊异。它发表于甲午战争之年,南京条约后52年,而比中国开国要晚的日本已经颁布宪法、成立国会、出现反对党。郑观应并非顽固派,他先在上海外国企业中任买办,后转入洋务运动的织布、轮船、电报、炼钢、铁路等建设事业,乃中国第一代技术官僚。他的天下主义修辞当为逢迎士大夫阶层而作,但足以反映当时中国思想意识变化之缓慢。

其实,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朝政府已不得不承认“天下万国”共存之局,因此有总理衙门这个半现代式的外交部之成立。至90年代“戊戌维新”

① Marcel Granet, trans. by Kathleen E. Innes & Mabel R. Brailsford,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0), p. 46.

② 《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3页。

之前夜,外交官吏、通商口岸的记者和买办对世界应有一般的常识。但广大的士大夫阶层的世界知识却不敢恭维,这一点从维新运动的“先锋”身上就可看出。根据康有为自编的年谱,他直到1874年才“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①梁启超则于1890年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②两人该时都恰巧是17岁。至于都是读了《瀛环志略》,或非巧合,当时中国有关世界知识的书本来就寥寥可数。这里暴露了当时教育制度之落伍,以及康梁诸人处于权力和资讯之边缘地位。

天朝残剩的自满自得心理,在甲午战争败绩后,已荡然无存。它所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一个扩大了的世界重新放置中国。但他们仍透过儒家的天下主义去理解现代国际局势。他们设定的最高目标仍是“平天下”而不是建国。他们重新诠释儒教,以便包容新兴的达尔文主义。康在1885年至1887年间已从公羊学说中衍生出单线进步的“三世”说。他把斯宾塞的“进化论”嫁接到他那个土产的图式上头,使公羊学说和维多利亚式社会进化论产生共鸣。

在康未更动以前,公羊学说原是一个空想的“平天下”议程,经由三个阶段展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一阶段有它相应的制度。太平或大同成分升级的时序,也表现为此成分在空间里做同心圆涟漪式的扩散,直至取消“内外有别”为止。第一阶段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高阶段是连夷狄也能包含在儒家的世界秩序里,达到“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③在新的公羊学里,从前列于蛮夷的欧美等国,已被视为在社会进化的阶段上超出中国:民主的美国在内政上已趋“太平世”,而君主专制的中国则仍处于“升平世”的初级阶段。虽然在全球范围来说,人类仍处于战国状态的“据乱世”。^④

康派的文明观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单线进化论合拍,只不过把“白种人的负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7页。

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③ 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163页。

④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7—11页。